

从“弑父”主题的有无看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

张磊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文章通过考察流贯西方文学中的“弑父”主题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缺失,揭示了东西方两个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伦理文化的差异,西方所处的子文化体系与中国所处的父文化体系的差异。

关键词: 弑父;缺失;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39-(2006)04-0043-02

当我们对西方文学进行整体回顾或扫描时,可以发现古希腊神话中反复出现的“弑父”母题,亦流贯于后代各个阶段的文学中。反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弑父”却始终是一个缺失的主题。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就会看到,中西文学中父与子的关系背后隐藏着的是更为深刻的中西传统文化差异。

在西方文学史上,“弑父”是一个不断重复并包含着深远意义的主题,从古希腊忒拜神话中俄狄浦斯的传说开始,子之弑父的事件便不断重演。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取材于这一神话传说创作了悲剧《俄狄浦斯王》。故事一开始就揭示神谕,由于拉伊俄斯曾劫去恩人帕罗普斯的儿子,神诅咒他必遭报应,拉伊俄斯将死于自己儿子之手。为了逃避这一神谕,拉伊俄斯与妻子将婴儿的两脚踝刺穿,用皮带捆着,放在喀泰戎的山上,希望他死于饥饿或野兽。但拉伊俄斯最终也没有逃脱命运的控制,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拉伊俄斯,即杀死了自己的亲身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做妻子。当一切真相大白之后,俄狄浦斯选择了刺瞎双眼、流落他乡的方式来惩罚自己。到了17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英国剧作家屈来顿都模仿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创作了悲剧,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文学中对“弑父”行为的描写并非肇始于索福克勒斯。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至7世纪初,古希腊著名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的创世神话就表现了诸神内部父与子之间惊心动魄的权力之争,也记载了一系列的弑父事件。其中,既有克洛诺斯在地母的帮助下对天空之父——

乌拉诺斯进行阉割的事,又有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宙斯征服,被儿子从尊位上赶下台的事。到了近代,有更多作家沿用了俄狄浦斯这一古老神话的母题和意象,进一步表现了子的弑父意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罗布·格利耶的《橡皮》以及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等。纵观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弑父”这一主题贯穿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中。

然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弑父”却几乎是一个缺失的主题。对于古人而言,弑父和弑父意念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不管是早期的《论语》,还是《孝经》,或者是后来封建社会提倡的“三纲五常”都将“孝”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孝已经成为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这就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使他们无法超越孝的束缚,将“弑父”的主题引入中国文学。纵观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虽然“父亲”的形象并非十分完美,父与子的关系有时也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但“弑父”这一主题终究没有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二

“弑父”主题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缺失体现了中西传统文化间的差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处于不同文化体系之中的宗教文化和伦理文化的差异。按照现在学术界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西方文化称为宗教文化,而把中国文化称为伦理文化。“弑父”之所以在西方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与西方人特有的宗教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上帝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的父亲,他“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负荷一切、充裕

收稿日期:06-01-04

作者简介:张磊(1981-),女,山西大同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1]上帝是最完美的父亲，养育我们的父亲只是他借给我们生命的工具，他是唯一绝对正确、无所不能的权威，他的爱施与所有的人。因此基督教规定“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2]而世俗的父亲作为凡人，却是不完善的，有着凡人的缺陷和罪恶。因此在世俗的父亲和神圣的天父之间，只有后者才是绝对永恒的。子为了追求永恒，可以放弃、否定世俗的父亲。

另外，宗教文化注重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人们把上帝当作真正的父亲，他们认为爱上上帝即可以达到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即可以使灵魂超脱现实世界而升入光明纯净的天国。这样，西方的宗教文化就为子之弑父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使弑父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宗教文化也为弑父者提供了精神出路，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上帝的救赎最终摆脱彼岸世界而获得解脱。

在中国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国文化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典型的伦理文化，它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骨肉亲情。如《孝经》中所记载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给予了子女生命，子女则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因此，我国自古以来就提倡孝道，如“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游”等，“孝”成为中国礼教之首。孝道中又强调“无违”，这样对父亲的尊重和服从就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心理积淀。在古人的观念中，“弑父”是一个永远都不能谈论的话题。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对父亲的反叛也就是对在生物学上得到合理证明的权威的反叛，杀害了父亲也就破坏了保存着集体生命的秩序，反抗者对整个集团因而也对他们自己犯下了罪。他们无论是在别人还是在自己面前，都是有罪的。”^[3]“弑父”就等于否定自己的生命来源，就等于否定自我。因此，伦理文化并没有为古代的文人提供一个发挥和想象的空间。

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4]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中国文化努力追求的价值目标。人们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家和万事兴”。文化塑造人格，在这种伦理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打破这种和谐，也无法承受“弑父”之后的负罪感，因而也无法实践这一沉重的文学主题。

此外，如果用“父文化”和“子文化”来界定中西方的文化时，西方文化无疑属于“子文化”的体系。因为在一个父权制的社会中，西方文化不断重复的弑父主题，主要在于弑杀一个拥有父之身份、父权地位和权力意志，并对子构成生命威胁的具象之父，而不在于取消父权制本身。子之弑父就是为了使成为父亲，反叛权威就是为了使成为权威。例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为自己在长期卑屈处境下郁积起来的怨毒情绪所驱使”，^[5]又因为受了二儿子伊凡的暗示，“终于利用了这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6]。他之所以反叛父亲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在中国，子必须对父绝对服从，否则被视为不孝。父对子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子不得反抗，也不敢反抗。子只有在父去世，继承父的地位之后，才能树立权威，并开始对下一代“子”的控制。中国的“子”是通过熬到“父”的地位来捍卫父权制，西方的“子”是通过“弑父”来进一步巩固父权制。因此，我们又可以用“弑父”文化或“子文化”来概括西方文化，用“崇父”文化或“父文化”来涵盖中国文化。

综上所述，从“弑父”主题在中西方的不同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中西方之间重大的文化差异。虽然相比起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辉煌、非常繁盛的，但是由于缺乏一种宗教精神的牵引，中国的伦理文化也缺少一种强烈的向前追求的欲望，因此也导致了中国人容易满足、安于现状、缺乏探索精神的文化心理。而西方宗教文化的理想虽然冰清玉洁、崇高典雅，但却有些不近人情、不合人性。它造成了西方社会中普遍的灵与肉二元对立的状态，造成了西方人精神世界的恐慌，也使西方人的心理处于一种焦虑不安、永不满足的追求中。文学作品中父与子的关系，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复杂的中西传统文化差异。

注释：

[1]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5.

[2]圣经·马可福音[M].第12章,第30—31节.

[3]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2—43.

[4]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83.

[5][6]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译本出版说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Looking at Sino-western Tradit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from patricide Topic

ZHANG Lei

(Literature School,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opic "patricide" in western classic literature which does not exist in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show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ino-western cultural systems, between western religion and Chinese ethics and between western son cultural system and Chinese paternal cultural system.

Key words: patricide; destitute; cultural difference